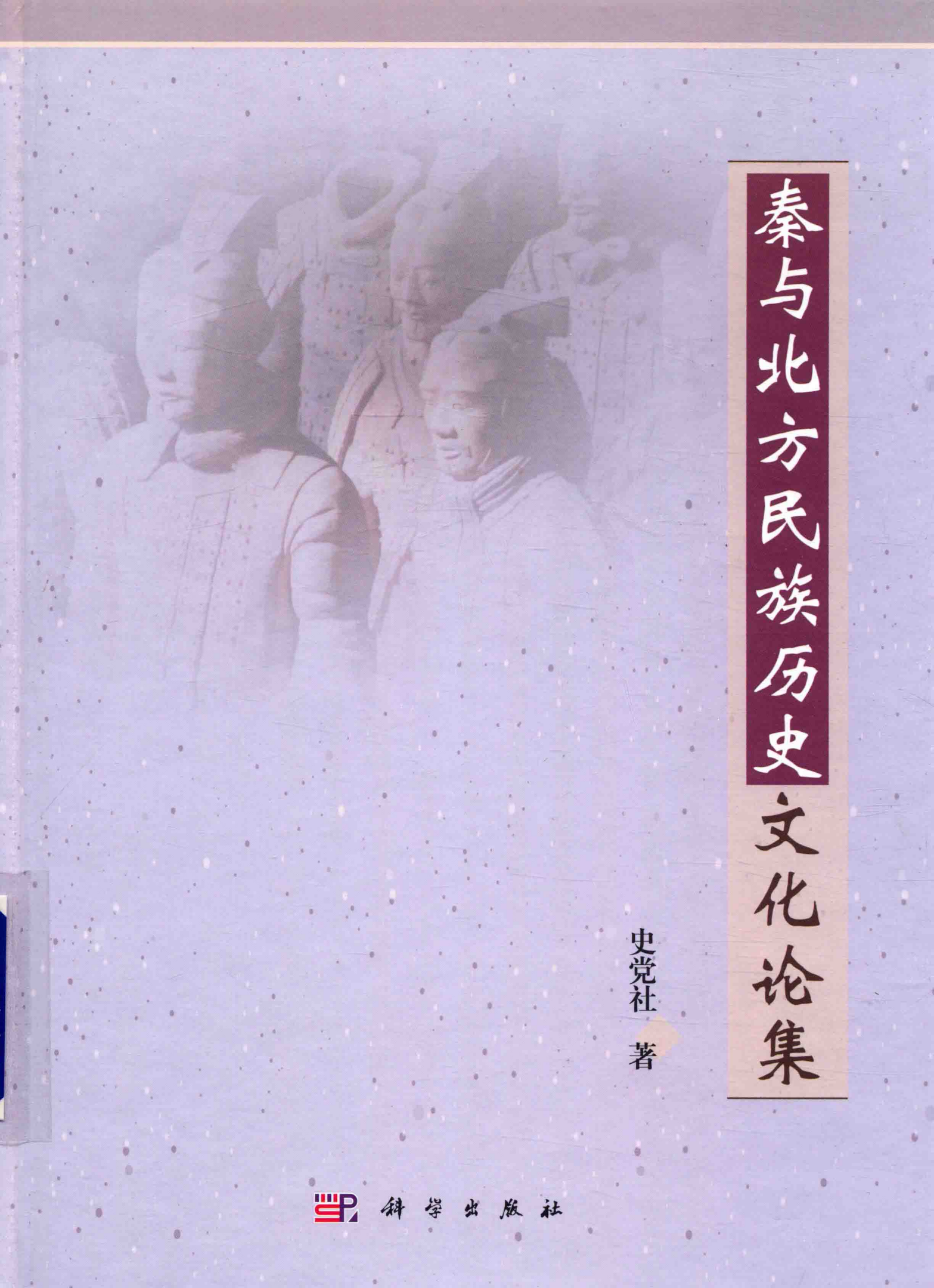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faded, artistic rendering of several terracotta warrior statues from the Qin Dynasty. The figures are shown in profile, wearing traditional armor and carrying spears. The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shades of brown, tan, and grey, giving it an ancient and historical feel.

秦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集

史党社 著



科学出版社

秦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集

史党社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秦及北方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内容分为三部分：秦与“戎狄”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秦与比邻“戎狄”历史、文化、族群的关系；探讨北方与中原的关系，是秦与“戎狄”关系视角的扩展；以书评的形式，探讨了族群、文化关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族群理论、畜牧和游牧等问题。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历史、民族等相关专业的研究学者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及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集 / 史党社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03-059396-2

I. ①秦… II. ①史…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2541号

责任编辑: 赵 越 孙 莉 吕 治 / 责任校对: 王萌萌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1月第一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插页: 10

字数: 400 000

定价: 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部分内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
“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
(项目编号: 14ZDB028)
子课题“秦的崛起及秦的统一”成果

目 录

上部 秦 与 北 方

甘、宁地区秦长城考察记·····	(3)
考古资料所见先秦时期秦人交通陕甘的几条路线·····	(9)
刘坪墓地若干问题初论·····	(17)
秦马车的文化史意义——从秦陵出土铜车马谈起·····	(23)
多彩的“边疆”——考古材料所见公元前7~前3世纪秦之西北边地文化·····	(39)
同样的人群、不同的道路——秦对“西戎”的两种控制方式及历史意义·····	(54)
起于“戎狄”——秦与比邻少数民族群的关系新探·····	(72)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与秦汉“胡风”·····	(98)

中部 先秦—秦汉时期的北方

猗狁、乌氏的地域及文化散论·····	(117)
从考古新发现谈前丝绸之路的一些问题·····	(126)
重读嘉峪关的历史地理地位——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角度·····	(136)
中原视野下的固原——从商周至秦·····	(145)
公元前4~前3世纪的鄂尔多斯游牧社会·····	(154)
“邯郸命吏”侧证·····	(170)
鲜卑的源流及相关问题·····	(177)

下部 书 评

天山并不遥远——读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	(191)
王明珂的“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读王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95)
《秦都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的学术意义·····	(200)
后记·····	(203)

上部

秦与北方



甘、宁地区秦长城考察记^{*}

1999年8~9月,笔者与秦俑考古队的任建库先生对甘、宁地区与秦相关的文物进行了考察,秦长城乃是其中之一。我们这次考察了临洮县新添乡三十里墩村城墙岭和尧甸(窑店)乡长城坡、陇西县福星乡沙漠湾雷神堡子、固原明庄梁四个地点的战国秦长城。现将这四个地点的秦长城现状及相关问题报告如下。

一、临洮城墙岭

长城位于今临洮县城北三十里墩村东丘陵顶部,西邻临洮河谷地,北为洮河支流大碧河,河岸十分陡峭。从三十里墩村向东往岭上而行,首先为杀王坡,这就是今甘肃等地学者常说的现存战国秦长城的起首处,由于不熟悉情况,我们并没有到达杀王坡。长城由此往岭上无遗迹,东行到达南坪村北城墙巷复见,现立有省级保护碑。一条小路已凿开长城中部,路两边夯层清晰可见,在小路中如入巷中,故名城墙巷。城墙巷一段长城现存约200米,高5~8米,夯层厚6.5~20厘米,土质为纯净黄土,由城墙巷上行即城墙岭。

城墙岭上地势较平坦,起伏不大,视野开阔,西为洮河,北为大碧河峭壁,东南群山一望无际。此段长城长约1千米以上,已偏向东南而行,中间被水冲成一条大沟。现长城内侧即南侧比外侧稍高,长城现高1~2米,宽3~4米,圆夯,夯层6.5~8厘米;沟对面的一段存20~30米,现高2.5米,夯层同。城墙岭内侧有一处瓦片分布区,有成堆的麻点纹、绳纹板瓦、筒瓦片、器身残片。此处并发现了礧石,为天然鹅卵石,或由之加工而成。经实测,轻的重1.5~2市斤^①,重的在7~8市斤,也有10余市斤者。由于岭上皆为深厚纯净的黄土,这些石头显系从河道中带来;在长城其他地方那个亦有形制、大小相似之物。因此,这些石头为防御用礧石应是没有疑问的。

二、临洮长城坡

本段长城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②、20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已有考察^③,对照甘肃省博

^{*} 本书的部分篇章撰写年代较早,所据为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地名,为符合历史情况,一仍旧名而不进行更改。

① 1市斤=0.5千克。

② 顾颉刚:《甘肃秦长城遗迹》,顾著:《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7~78页。

③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2~67页。

物馆的同志20世纪50年代所拍照片^①、史念海先生20世纪70年代所拍照片^②，本段长城变化不大。

尧甸乡位于今临洮县城东南的25千米处、洮河支流尧甸河谷地中，向东南约30千米即渭源县渭河谷地。临洮—尧甸—渭源—陇西—天水的道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的干道之一。

长城坡位于窑店乡政府东南约5千米的尧甸河北岸，西边为池沟河，是窑店河支流。长城从三十里墩村向东南而来，经过长城坡山脊，又向东南迤逦而去。本段长城坡的一段残长约400米，中间被道路凿一豁口，今地形为内（南）低外（北）高。基宽3~4米，残高2~8米，圆夯，层厚为6~6.5厘米，又有8.5厘米直至厚10.5厘米者。岭上最高处似为一墩台，残高8米以上，断层上可见下为生土层，上为夯土层，层厚3~8厘米。墩台内侧为一建筑基址，在40~50米见方的地域内，有大量瓦片堆积以及夯土遗迹。似为障城一类建筑。瓦片以板瓦为主，外饰绳纹，内饰麻点纹或菱形纹；或内外皆凸弦纹。在长城倾圮土层中，有礧石3个，2个为鹅卵石，与城墙岭相同；1个为红色砂岩片。这种红色的岩片，之长城坡一带山体下部随处可见，乃就地取材而成。重量分别为1、4.2、4.9市斤。

从长城坡山上西北望去、池沟河对面山脊上长城现为人行道，为一条明显土垄，山顶部城垣外侧加筑有三道楞坎。这种筑城方法与陕北吴起县薛岔乡马蹄梁—五谷城乡石嘴村一段战国秦长城同^③。

三、陇西沙漠湾

沙漠湾村位于今陇西县城北约35千米处、福星乡北、定西—陇西公路旁。秦长城呈东西向，蜿蜒于村东南两侧山脊，目可及之长度在3千米以上。

在沙漠湾村西山顶长城上，有一障城遗址，保存较好，当地人称雷神堡子，其中有今建雷神庙一座。

障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00米，面积在10 000平方米以上。城墙保存较好，厚3~4米，高7~8米，圆夯，层厚6.5~9.5厘米，最厚达14厘米。墙顶部外侧似有短墙，或是城垛（堞）之迹，今外高内低。城墙四角有方形墩，似为角楼。东西二墙正中有凸出的马面。西墙马面顶部有东西向三道短墙痕迹，并有大量瓦片堆积，应是建筑所留。东墙马面顶部似亦有此类短墙痕迹，但不明显。南墙上有一拱形门，用土壅封住。门外东侧有一短墙伸出，似瓮城。城外侧另有一圈夯筑短墙，残高0.5~1米。短墙外围壕沟，深7米以上，壕沟两侧可见明显夯层，略似墙体。障城内西北角有一烽燧遗迹，现高5米。内外夯层不一，内层厚12~18厘米，外层厚7~10厘米。

障城附近发现礧石10余枚，用鹅卵石加工而成。按重量分有两种，一种为7~8市斤，另一种重10余市斤，形制与临洮所出同。

此障城形制极似西汉武帝“外城”附近的内蒙古潮格旗汉代乌力吉高勒城障^④；西墙马面顶上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图片三。

②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图十一。

③ 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地区战国秦长城考察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图二：3。

④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2~224页，图三：1。

的筒瓦、板瓦时代不早于宋、明时期，由此推断，此障城的始建年代上限应不早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宋、明时期加以修葺继续利用。

四、固原明庄梁

明庄梁位于今固原西北部约3千米的清水河左岸，固原—银川公路从中南北穿过，西邻六盘山。这一带地形为舒缓的丘陵地带，长城即建于丘陵缓坡上，呈东北—西南走向。与陇西、临洮建于山区的长城不同，此处因地形较平坦，因而长城筑得十分高大，现地基宽近10米，外（北）侧有壕沟，深处可达10米。长城外侧高10余米，内侧高3~5米。约100米有一段现呈鱼脊状城墩。城墙垣圆夯，层厚6~19厘米。在内（南）侧最高处，距城墙约50米处，有障城址，平面方形约45米×45米，现高4~6米。障东南角有一烽燧遗址。障夯层厚6~9厘米，最厚处有12.5厘米。

在明庄长城及障城附近，有许多瓦片及瓷片遗存。瓦片以板瓦为主，有内外皆饰凸弦纹者；有内布纹、外散乱绳纹者；有内麻点纹、外绳纹者。此三种与我们在临洮、陇西一带所见标本相同。又有板瓦片内素面、外细绳纹；有的内布纹、外素面；有的内素面、外饰粗绳纹。所见瓷片为青花瓷，时代约当明代，因此我们初步认为，明庄长城为秦国始筑，汉等朝代续有利用。

战国秦长城的考察与研究，从1949年以前顾颉刚先生^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念海^②、彭曦^③等先生，以及近年来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学者的实地勘查或研究，其走向、建筑方式等大的方面已基本搞清，但并非已穷尽所有问题。我们这次除了考察上述四个地点之外，还观摩了甘肃省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陇西县博物馆、定西地区博物馆、平凉地区博物馆、庆阳地区博物馆及临洮师范学院孙益民先生所藏战国长城附近所出板瓦、筒瓦、簇、剑、斧等标本，又与初师宾、苟惠迪、孙益民、何钰、张克仁、杨万荣、罗丰、刘得桢、李红雄等先生交流，了解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本地区长城的相关情况。这些人大多亲自勘察过战国、秦汉长城，看法自是有力^④。孙益民、何钰先生又赠送战国秦长城实察资料。这些教益是我们作实地勘查外的另一重要收获。

秦筑长城，或认为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战国初年秦简公“堑洛”长城，早年史念海先生曾作过调查^⑤，后来呼林贵^⑥、彭曦^⑦又作了一定工作，也有一些争论^⑧。这段“堑洛”长城所筑时间在前408年，性质是否定为长城还可讨论。第二次是张仪相秦时筑“上郡塞”长城，时间在秦惠王后元

① 顾颉刚：《甘肃秦长城遗址》，顾著：《史林杂识初编》，第77~78页。

②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③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1~195页。

④ 这些先生的相关论著如下：孙益民、王楷：《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兰州学刊》1982年第1期；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文物》1987年第7期；何钰：《秦长城西部起首崆峒山刍议》，《社科纵横》1994年第1期；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境内长城调查与探索》，《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⑤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⑥ 夏振英、呼林贵：《陕西华阴境内秦魏长城考》，《文博》1985年第3期。

⑦ 彭曦：《秦简公“堑洛”遗址考察简报》，《文物》1996年第4期。

⑧ 瓯燕、叶万松：《“上郡塞”与“堑洛”长城辩》，《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元年（前324年）^①。第三次是秦昭王灭义渠后，在上郡、北地、陇西三郡之边所筑长城。秦昭王灭义渠在其三十六（前270年），筑长城即之此后的若干年。第四次即秦始皇时期派蒙恬所筑长城，已向北大扩展。这条长城不仅某些地段沿用燕、赵长城，且又有所新筑^②。

我们这次所考察的兰州以东的甘、宁部分地区，地属秦陇西、北地二郡，长城的情况涉及秦昭王与秦始皇长城，以下对比稍加辨之。

关于秦昭王长城，即我们本次所考察之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秦昭王时，义渠戎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甘泉，遂起兵伐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经过多年考察，这条长城走向从今临洮县北三十里墩村杀王坡开始，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固原、镇原、环县、华池、吴镇、志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准格尔旗，最后到达内蒙古托克托县城附近黄河边。历经甘、宁、陕、内蒙古四省区，全长约1700千米^③。关于其东北端即进入鄂尔多斯走向，辛德勇的研究与传统说法有异^④。

秦并天下后，秦始皇又使蒙恬率众新筑另一条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大体相似：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至阳山北假中。

这条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关于这个“临洮”的所指，诸家说异。按，秦有临洮县，属陇西郡，即今岷县；陇西郡治狄道，即今临洮。说者多以为秦“临洮”即今岷县。此说大约从《括地志》起，至史念海先生，多有从之^⑤。另外，也有学者并不同意岷县说，以为临洮大致是一个泛称，指洮河旁地方，如何钰、孙益民、陈守忠^⑥等人。这些人经过实地勘察，发现从今渭源

①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延安地区文管会，姬乃军：《陕西富县秦“上郡塞”长城踏察》，《考古》1996年第3期。

② 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6～20页；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迹》，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34～39页。

③ 详可参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234页，图八十二。

④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处西北边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云中九原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⑥ 陈守忠：《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何钰、孙益民说出处同上。

或是临洮至岷县，没有秦长城迹象。

基于这样的理由，何钰对于秦始皇长城起于岷县说持“存疑”态度。另外，如孙益民、王楷则认为：“现在临洮境内直到渭源、陇西、通渭、德隆境内的秦长城，是秦昭王时修建的，是蒙恬以后缮修或增修的长城，它是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今临洮是万里长城的起首。”此说曾被中央电视台《望长城》节目采用，有一定影响^①。还有陈守忠等人认为秦始皇长城“既不起自岷县，也不经过兰州”，临洮等所谓“起首处”长城只是秦昭王长城，秦始皇并未沿用。

对于有关秦始皇长城西起首这些纷纭说法，不可否认的是以下事实：

第一，文献如《史记》《括地志》有起于“临洮”之记载，后人理解不同；

第二，在今渭源、临洮—岷县没有秦长城遗址的明确发现。

实际上，秦昭王与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时间相去半个世纪；现在通过实际勘察，秦昭王长城西部起首处在今杀王坡一带，大约没有问题。即秦昭王长城起首西依洮河谷地，向东而行，然后折向东南，河谷地带没有必要再去筑墙垣。这样可把陇西县郡首县治即狄道拱于其内，同时被保护的当然还有向东沿今尧甸河—渭源—陇西—武山—甘谷—天水—清水（张川）（—陇县、咸阳）的这条古老的交通干线。现在已发现，秦汉狄道县城就在今临洮县城稍偏北之处，大部被今临洮城所压。秦昭王长城有没有越过洮河西去，或再由西向别处，今在洮河以西地区无长城遗迹可证这些可能并不存在。先秦、秦汉时期，洮河以西地区、向西越大夏河，包括兰州以西的所谓河湟地区，史称“羌中”，是古羌族的聚居区，这一时期羌人向东、向南扩散，其事可见《后汉书·西羌传》，并可参俞伟超相关论述^②。羌人向南、向东扩散路线有如下几条：沿洮河谷地、大夏河向南越过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岷山，到达今川西北为一条；这条路又可沿白龙江向东南而行（商—西周时期寺洼文化东南交通，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还有一条道路，即前文屡称的临洮—天水沿尧甸河—渭河谷地的古丝绸之路的那一条，这条路又可从天水南折，经陇南沿嘉陵江等达到川北广元一带。这三条路线，至今仍是重要的公路干线。秦昭王时司马错定蜀走的就是临洮—白龙江谷地那条路线，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汉初匈奴“三困陇西”，走的应是黄河—洮河谷地的这条。河湟地区古羌人（后来又有匈奴）向东南的这些交通路线，狄道正处于其焦点上，其位置扼后两条路线的要冲，也自然把最西一条抛于其西。秦昭王把长城建在狄道以北三十里（约合秦制四十里），就是为了保卫这一重要据点。同时，我们又发现，从今临洮（狄道）—陇西的一段秦昭王长城，与南侧的临洮—陇西的交通路线平行，保护交通要道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无论如何，西以洮河为险，北筑长城，可以保护陇西郡治狄道与交通要道的安全；在洮河以西，今临洮、渭源以南亦无长城遗迹发现。这两点说明，把秦昭王长城西端定在今临洮河谷地杀王坡一带，是正确的。彭曦认为这条长城由杀王坡转而向西至洮河谷，沿洮河东岸南行，把狄道拱于其内（东），其实是毫无必要的^③。笔者鄙见，秦人接续秦昭王长城、在洮河谷地东西设关塞，依托狄道城本身，即可达到防御目的。

① 蒙孙益民先生厚爱，我们于孙先生处又重新欣赏了此片。

②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俞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0～210页。

③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259～260页。

秦昭王长城西起首处即之今临洮北三十里处杀王坡一带，洮河东岸，无论后来的秦始皇长城所起首的“临洮”指今岷县，或是泛指洮河边的地方，其与秦昭王长城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今天所言秦之“万里长城”，指的是秦始皇所修“临洮”——“辽东”的那条长城，与秦昭王长城有别，二者所指不同。甘肃当地有学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并把秦昭王长城起首今杀王坡一带当作秦始皇“万里长城”的起首处，并无多大说服力。

那么，秦始皇长城起首究竟在何处？

首先应该指出，甘肃学者认为“临洮”是泛指的说法，是错误的。文献载秦始皇长城，西所起为“临洮”，东至“辽东”。按如上文所言，“临洮”为秦陇西郡属县，即今岷县，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非泛指，故岷县今天有无长城的发现，都不足以作为否定其为秦始皇长城起首地的证据。今在洮河三十里墩村以北洮河岸边没有发现秦长城遗迹，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长城西起于“临洮”，并“因河为塞”^①，使“众羌不复南渡”^②，以此理度之，秦始皇长城起首必在今岷县附近，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另，秦有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东市），至今也没有在今秦襄平附近发现秦长城遗迹，推敲“辽东”应是泛指辽东郡一带。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蒙恬将众所修长城，从洮河岸边岷县某处（临洮）起，沿黄河向北至阴山，折向东延伸^③，并部分利用赵、燕长城旧迹^④，东达“辽东”，或可到今朝鲜半岛北部^⑤。相对于秦昭王长城，这条防线向北大大扩展，秦昭王长城已经处于秦版图之内。“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⑥这十余年间，秦昭王长城被短暂废弃，称作“故塞”。汉前期，“故塞”被加以利用，高后、文、景之时，有匈奴“三困陇西”^⑦、入朝那萧关、肤施事^⑧，皆是汉因秦“故塞”之证。不仅如此，蒙恬所筑临河长城，也被利用，《史记·高祖本纪》载“缮治河上塞”即此。武帝时期，对匈奴用兵，汉朝处于有利地位，武帝既对蒙恬因河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利用，事在元朔二年（前127年）^⑨；又新筑长城，“出五原塞……至庐朐”，相对于所修缮之秦始皇长城，称“外城”，事在太初三年（前102年）^⑩。自元朔二年（前127年）后，可以想象，秦昭王长城长期被废弃，而秦始皇长城临河段自太初三年（前102年）以后，可能也曾被废弃^⑪。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西羌传》。

③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68～76、117页；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图三：1。

④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图三：1。

⑤ 《水经注》卷三；《通典》卷一七八。

⑥ 《史记·匈奴列传》。

⑦ 《汉书·晁错传》。

⑧ 《史记·匈奴列传》。

⑨ 《史记·匈奴列传》。

⑩ 《史记·匈奴列传》。

⑪ 这是根据文献的推测。据新公布的岳麓秦简，秦代作为“故塞”的秦昭王长城，仍被利用。

考古资料所见先秦时期秦人交通陕甘的几条路线

陕、甘是商周的“西垂”，秦祖在商周时期已经到了陕、甘一带，然秦岭、陇山，历来为陕、甘险阻。秦祖早期生活于今天甘肃的天水、陇南地区，春秋以后政治重心转移至关中西、中部。历史上秦人与周人、西戎等族群的交往，必穿越二山，所经之沟通陕、甘的通道，可名之为三条：故道、渭水道、陇山道。下面笔者结合考古材料对此三道作粗略论述，对于其他如陕西关中与甘肃平凉、庆阳，以及陕西汉中与甘肃陇南地区的交通，则非本文论述的对象。

一、故道

故道又名陈仓道，一般以为故道的走向是起自陈仓（今宝鸡市东），沿散关入故道水（今嘉陵江）西南行，至今凤县唐宋凤州古城折东南经凤岭入褒谷，出抵汉中。

文献中有关于故道的记载，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从汉中还定三秦时说：

汉王用韩信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

《史记·曹相国世家》有同样记载：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郿。

这两条资料都涉及故道，此处作为县级行政机构的故道，显与作为道路的故道有关。后条《史记·曹相国世家》把故道与下辩、雍、郿等县名并列，说明秦时已经有故道，秦封泥有“故道丞印”^①，《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汉时武都郡下有故道，道是战国秦、秦汉与县同级的地方行政机构。秦汉故道的位置，历来有二说。《水经注·渭水》说：“渭水又与捍水合，水出周道谷北，经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其水又东北历大散关而入渭水也。”按，捍水即今宝鸡城区西南地方之清姜河，以此推论，秦汉故道县应在今凤县北部一带。现代学者有以为在今凤

^① 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图52。

县与宝鸡市交接的秦岭梁一带；或说即上文已提到的今凤县县城双石铺东北的凤州古城一带^①。与之不同的是《括地志》的说法：“凤州两当县，本汉故道县，在州西五十里。”唐时凤州在今凤县东北约8千米处的凤州古城一带；两当县在今两当县之杨店镇一带，据此秦汉故道县当在今两当县东北12千米的杨店镇一带。

笔者以为，秦汉故道的位置应以《括地志》记载为是，就在今两当县东北的杨店镇一带。第一，前引《史记·高祖本纪》说汉王刘邦“从故道还”，《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得更加详细，所经道路，是汉中—下辩—故道—雍—釐。汉中即今汉中。下辩，《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成州同谷县，本汉下辩道。”《汉书·地理志》下辩道属武都郡，唐时为同谷县，地在今甘肃陇南地区成县西北。秦汉下辩县既在今成县西北，如从汉中由此路返还关中，则所经必是今徽县—两当—凤县一路，并非从汉中向西北至今凤县东北的凤州古城，直接沿嘉陵江至关中。第二，《史记·河渠书》说：“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若从今凤县折向东南至今汉中，凤县以北为嘉陵江谷地，并不“多阪”即多山，也并不“回远”即绕路，只有在从今凤县西南行，经略阳至蜀，才可曰“回远而多阪”。所以，《史记·河渠书》所言“故道”虽为道路之名，但也可说明汉时作为县道的故道，是与今陇南相联系的。途中所经的两当、徽县、略阳以及川北地形，也与之符合，秦汉故道，应是经过了今两当县的。

今属两当县的杨店镇一带，处于川、陕、甘三省交通的要道上，自古是交通要冲。杨店镇东依嘉陵江支流红崖河，越红崖河东南行穿灵官峡，即至今凤县；向南经今徽县、略阳可通汉中、蜀；向西则可通今之成县、武都，直达于蜀；西北则通天水。这些古道，部分今天仍然被沿用着。

有文献记载证明，故道可能较早被秦人发现并利用，是秦人陕甘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史记集解》引徐广说：

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解释较为详细：

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批发，以朱丝绳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牛神也。”按，近俗画青牛障是。

怒特祠所在，必不出今陕西宝鸡市—甘肃陇南市一带，正位于关中通往汉中、陇、蜀的要道之

^① 前者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11～12页，“淮汉以南诸郡”；后者如吴镇烽，见吴著：《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8页。

上,其上属作为县道的故道,当在于此。还有一条资料,就是《华阳国志》的记载,其文曰:

(开明)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今四川名山北),雄张獠獫。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帝称王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

卢帝所处时代约当春秋中期的秦穆公时期,推测卢帝攻秦至雍的路线,也是从故道而出。此两条材料证明了秦人涉足这一路线的年代,可以早至春秋时期。

同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是谭家村^①与益门村^②出土的几把戎狄式短剑,二地分处于故道口清姜河两岸,出土短剑的谭家村M24,年代在春秋早中期;益门村M2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在几乎同一地点出土几把戎狄式短剑,是不多见的。几把短剑的主人,应该都是“戎狄”。这些材料连同下面西周时期的材料,可以说明故道与西北少数民族有密切联系,是秦人和这些族群交通的要道。

在今凤县龙口镇郭家湾村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其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本条道路的存在^③。郭家湾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下文化层属于仰韶文化系统。在上文化层中,不但有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的陶马鞍口罐、双联罐,还有蜀式陶尖底罐、钵,以及西周早期的陶鬲。简报的作者说郭家湾村上文化层的年代在“战国时期”,嫌于偏晚,由同出的西周早期陶鬲判断,郭家湾村上文化层的年代上限当在西周早期。

位于今宝鸡市西南的蒙峪沟口墓地以及茹家庄、纸坊头、竹园沟等地的虢国墓地,文化特色与郭家湾上文化层具有相似的情形,都是周文化、蜀文化、寺洼文化三种因素并存。虢国墓地的主人被猜测可能是氐羌族^④,时代当商末至西周早期的成王一昭王时期。竹园沟等地的虢国墓地中的寺洼文化、蜀文化等因素,可能就是从今陇南、汉中一带进抵今渭水流域的,凤县郭家湾遗存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链环^⑤,而这个过程可能早在商代末期就已经发生了。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氐羌族一支的北上,关于北上的具体线路,虢国墓地的发掘者推测:

北上的路线可能由武都经康县、成县、徽县进抵今宝鸡南部凤县和甘肃境内两当县一带;或者循嘉陵江谷道北上,至凤县一带暂时定居下来,然后逾越秦岭,顺清姜水谷道北上发展到宝鸡渭水南岸清姜、益门、竹园沟、茹家庄一带建立古虢国。^⑥

郭家湾位于嘉陵江边,虢国墓地位于大散关口,二者一处故道之上,一处扼故道出口。相似的文化特征说明,故道早在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就是关中通甘、蜀的孔道,而实际的历史无疑还要更早。

在周原甲骨文、《尚书·牧誓》中,也有关于蜀人与周交往的记载,其年代的上限也已深入到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谭家村春秋及唐代墓》,《考古》1991年第5期。下引谭家村资料出处同。

②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凤县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56年第2期。下引龙口资料出处同。

④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虢国墓地》(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册第462页。

⑤ 张长寿:《论宝鸡茹家庄发现的西周铜器》,《考古》1980年第6期。

⑥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

商代晚期。周原甲骨文有“蜀子来朝（周）”的记载、《尚书·牧誓》中周武王率领灭商的西方八国也有蜀。本时期蜀人，生活于今天的陕西汉中—四川成都平原一带，他们与周之交往，很可能就是通过故道一线进行的。

根据文献记载，秦人祖先可能在商末周初已经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天水、陇南一带活动。其中渭水流域的天水地区可以甘谷毛家坪、董家坪两周时期的遗存为证^①，前者毛家坪遗址的年代上限可早至西周中期。位于白龙江、西汉水流域的陇南地区秦人活动年代最早的证据，是民国时期发现于今盐官镇十字路口村北西汉水一支流的秦车器，年代约当西周中期穆王时期^②。秦人在西周时期最主要的聚居地在水地区是秦城区、甘谷、清水，以及陇南地区的礼县、西和等县市。其中的西和、礼县一带，可能是秦祖自商末以来世代居住的根据地。商末、西周时期秦祖在水、陇南地区的活动，是为商周“保西垂”，与关中的交往在所难免，以理度之，这种交往经由的路线，无论是从陇南地区的礼县、西和至徽县、两当至凤县；还是从渭水上游的甘谷、天水南行至两当、凤县，然后沿嘉陵江上游河谷即故道入关中，都是比较便捷平易的。如果商末、西周时期的氐羌、蜀人已经通过这条道路与关中发生着关系，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与之比邻杂处的秦人不曾走过同一条路线？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龙口郭家湾上文化层所表现的葬俗。郭家湾遗存共发现5座墓葬，计有屈肢葬1座、鬲棺葬2座、瓦罐葬2座。屈肢葬全身向右蜷曲侧卧，头向西北。鬲棺葬以二鬲相合，内置婴孩骨架，仰身平放，头向西北。瓦罐葬由陶器碎片组成，陶片排列无规律，较大的两块压在婴孩骨架上，也是仰身平放，头向西北。

同样的葬式又出现于甘谷毛家坪遗存中。根据已公布的资料，毛家坪的A组遗存与B组遗存都发现了鬲棺葬，计A组遗存4座、B组遗存8座，共12座。葬式也是用鬲、罐、甗等陶器碎片遮盖婴孩骨架，如B组遗存的鬲棺葬，发掘报告描述说：

鬲棺葬的葬具多是残破的鬲片（可复原者一至三件不等），出土时堆放在一起，婴孩骨骼置其中，发现时多被扰乱，未扰乱者也未见坑埋痕迹，推测当时仅以鬲、罐片掩埋并培土覆盖。

毛家坪A组遗存中鬲棺葬的年代上限在西周时期，下限直至战国时期；B组遗存鬲棺葬的年代当春秋偏晚到战国时期。凤县龙口郭家湾遗存中的鬲棺葬位于上文化层的第二层，而西周早期风格的陶鬲出土于上文化层的第三层，因此鬲棺葬的年代当晚于西周早期，这样龙口郭家湾遗存中鬲棺葬的年代就约略与毛家坪A组遗存的鬲棺葬年代有所重合。另外，与鬲棺葬处于同一层位的上文化层的第二层，还有屈肢葬1座。这种鬲棺葬与屈肢葬共存的情况，与毛家坪的情况又是何其相似！以上的偶合指示我们，毛家坪遗存与龙口郭家湾遗存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偶合的背后，其实就存在着人员的往来。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下引毛家坪资料出处同。

② 李学勤：《探索秦国发祥地》，《中国文物报》1995年2月19日第3版。